

《心理科学进展》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经济不平等对地位焦虑的影响及其社会心理机制

作者：赵亚飞 张跃 张冀琦 郭永玉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该文提出了中产焦虑包含两种类型的焦虑：地位焦虑与向下流动恐惧，分别阐述两者的区别（产生的环境因素，背后的理论机制以及个体的应对方式）与联系（向下流动恐惧包含地位焦虑）。论文对于理解中产焦虑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论文还需要注意如下几点，建议如下几点修改后发表。

意见 1：如何把地位焦虑与向下流动恐惧均归类为中产焦虑，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从情绪的角度来看，恐惧与焦虑是两种不同的情绪类别，恐惧比焦虑的负向效价更甚。再者向下流动恐惧中实质包含了地位焦虑，向下流动恐惧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这两者如何均归结为中产焦虑，有待进一步说明。虽然论文在“3.4 两种焦虑的交织”中进行了说明，但是诚如作者所说，两者本质上仍是对地位的焦虑，并且这两种焦虑并非在一个维度上面，因此建议作者根据地位焦虑和由社会流动性引发的焦虑在不同维度上引发的焦虑进行一定的整合或者剥离，或者提出更为上位的概念。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您指出的初稿中“地位焦虑”与“向下流动恐惧”在概念维度、情绪本质及归类逻辑上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确实切中了初稿论证中的关键薄弱环节。我们完全认同您的判断，将两者简单归类为“中产焦虑”而未解释其内在结构与关系，确实不够严谨。针对您的意见，我们对论文进行了理论重构，主要修改与回应如下：（1）不再将“地位焦虑”与“向下流动恐惧”作模糊并列，而是基于地位焦虑的认知（即横向社会比较与纵向时间比较）与动机（即趋近-回避动机）过程，构建了二维四象概念模型（见修改稿 2.3 地位焦虑的概念重构）；（2）这一框架能够涵括并解释不同焦虑形态，这回应了您关于“提出更为上位的概念”的建议；（3）修改稿中的新框架，其解释对象并不仅限于“中产阶层”，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独特“土字型”社会结构下更为广泛的群体焦虑。中国庞大的中下层群体所面临的焦虑，同样（甚至更深地）源于横向比较与纵向时间比较的压力。

意见 2: 摘要中提及“一种是在社会比较过程中，由社会评价威胁引发的地位焦虑，另一种则是社会流动所带来的地位可能下跌的不安全感。”实质上地位下跌也隐含了社会比较过程，如果群体都处于向下流动的状况，那么实质上地位下跌并不能引发不安全感。建议作者对此扩展说明。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已在修改稿中通过理论框架的完善予以回应。在修改稿中，我们构建的基于认知-动机过程的二维四象概念模型，对两种焦虑的生成机制进行了更清晰的剥离，请见修改稿 2.3 地位焦虑的概念重构。

意见 3: 在“2 焦虑的根源：结构性的不平等”这一部分的第三点“2.3 地位寻求”在论述中更倾向于个体以诸如地位消费的行为缓解焦虑，与本节所讨论的“在不平等的社会中，较富裕的群体也可能更关心自己的社会地位。以下，我们将详细解释其中的原因。”有一定的脱节。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在本次对全文的理论重构与大幅修改中，我们已将这部分内容删除。

意见 4: “3.2 社会身份威胁”与“3.3 对下落的防御”在论述中实质都侧重于威胁感，而后者更为侧重的依然是较为行为层面的解释，与主题“3 焦虑的触发：社会流动性”有待进一步详述。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在本次对全文的理论重构与大幅修改中，我们已将这两节内容整体删除。

意见 5: 在文章结构的安排中，“4.1 “中产”群体的界定”和“4.2 “焦虑”的测量”放置论文开头似乎更为合理，放置于论文总结与展望处较为突兀，与“4 总结与展望”的关联度较弱。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在本次对全文的理论重构与大幅修改中，我们已将初稿中 4.1 中产群体的界定的独立章节删除，其中关于中国社会结构下地位焦虑研究对象问题的思考，前移至 2.2.3 对象局限 中进行分析。初稿中 4.2 焦虑的测量 部分已重新融入修改稿中

的 5.2 局限与测量完善 进行讨论。

意见 6: “从更全面的视角来看，简单地将社会流动性视为积极因素可能并不准确，特别是当这种立场与经济不平等相结合时，它甚至可能加剧现有的经济不平等问题。”针对这一论断建议持较为谨慎的态度。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在本次对全文的理论重构与大幅修改中，我们已将这部分内容删除。

.....
审稿人 2 意见:

该论文介绍了经济不平等可能通过两条途径——地位焦虑和向下流动恐惧——引起中产阶层的焦虑。文章中对于相关理论和以往研究成果的介绍较为全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意见 1: 对目标群体（中产阶层）的聚焦不清晰

1) ①文章以“中产焦虑”为主题，但是对目标群体即中产阶层的聚焦并不清晰。读完全文，最大的感觉是，无论是经济不平等还是社会流动性的影响，都不是特异性地作用于中产阶层（或是对中产阶层的影响特别显著），而是可以适用于任何群体。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所提出的这一质疑。初稿的逻辑并未清晰界定“中产焦虑”的特殊性，看似可普遍适用于任何群体。这一意见促使我们对论文的理论前提与定位进行了重新思考。在修改稿中，我们对研究对象进行了重新锚定：以往地位焦虑研究主要关注人际层面以及群体层面的中上层阶层群体。这主要源于西方的中产阶层占主体的社会结构。然而，这与中国土字型（中下层群体庞大）的社会结构现实存在根本差异(李强, 2016, 2021)。这解释了为何初稿的“中产焦虑”叙事显得模糊与普适，因为套用了一个与中国社会结构不相匹配的分析框架。修改稿的核心不再是论证“中产为何焦虑”，而是揭示经济不平等如何通过系统性机制，在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下，塑造出包括中产在内的形态各异地位焦虑。

②比如说，根据文中的逻辑，经济不平等导致人们更加关注和寻求地位，是因为有社会评价和社会比较的压力，所以中产才会感到地位焦虑。那么，中产以下的平民，岂不是应该比

中产感到更多压力、从而更加焦虑才对？

又比如，根据文中的逻辑，社会流动性（尤其是向下流动）令中产感到害怕，害怕被别人超越，那么，中产以上的富人，岂不是因为可能被更多的人超越、应该更加害怕才对？

读下来的总体感觉是，这篇文章本质上依旧遵循了社会阶层和不平等研究里的传统的“穷人和富人”二分法，然后从穷人那边挖了一块，又从富人那边挖了一块，拼在一起，当成是中产的焦虑。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深入追问。基于您的意见，我们在修改稿中对地位焦虑的阶层异质性进行了进一步论述，不再简单比较不同群体焦虑的量，而是分析质的不同。我们通过构建的认知-动机过程的二维四象模型（见修改稿 2.3 地位焦虑的概念重构）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背后的认知与动机过程不同，面临的焦虑形态和机制也是不同的（见修改稿 4.1 经济地位群体差异）。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面临的是资源限制与机会限制（趋近动机受挫）引发的地位焦虑，中等经济地位群体的焦虑则源于地位竞争与下滑担忧（趋近与回避动机的冲突），高经济地位群体则是对既有地位的维护焦虑（回避动机主导）。这一区分超越传统的贫富二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不平等社会复杂的心态结构。

2) 姑且不论以上做法是否合适，光是针对中产本身，文章里面也没有讲清楚，这个群体为什么重要？这个群体的焦虑为什么值得关注？中产的焦虑，跟平民或者富人的焦虑有什么区别？换句话说，文章并没有突出研究中产焦虑的必要性、特殊性、重要性和研究意义，有待更加详细地说明和论证。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在修改稿中，我们不再单纯聚焦中产群体，而是将地位焦虑的概念内涵及其形成机制扩展至中国土字型社会结构下的系统性心态困境。

意见 2：对经济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交互作用的论证明显不足

1) 作者提出了“社会流动性放大了经济不平等对地位焦虑的影响”这个观点，无疑是把社会流动性当成了一个调节变量，与经济不平等存在交互作用。问题是，从 3.1 到 3.3，介绍的全都是社会流动性本身对地位焦虑的主效应，而没有涉及交互作用。一直到了 3.4，才提了一句交互作用，而且仅是直接抛出了这个观点，缺乏前期论证，显得突兀且空洞。换句话说，文章对于交互作用的论证明显不足，与刚开始提出的研究问题不符。这个交互作用，

需要进一步阐述清楚，或者干脆删去（但这样一来，文章新意就略显不足）。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完全认同，初稿将社会流动性作为调节变量时，对其与不平等的交互作用论证不足的问题。在修改稿中，我们对理论框架进行了重构，提出经济不平等影响地位焦虑的双路径模型。我们不再将社会流动性视为一个外部调节变量，而是将其整合为经济不平等影响地位焦虑的“宏观路径”中的一个核心机制（见修改稿 3.2.2 流动信念：地位改变的可能性）。在新的框架下，我们论证的是经济不平等加剧如何通过固化机会结构削弱个体的社会流动信念，从而系统性地加剧地位焦虑。

2) 另外，以往研究显示，经济不平等本身对于社会流动性就会造成影响，无论是客观的（不平等社会里的流动性越低）还是主观的（人们感到流动性越低）（可参考《经济不平等对阶层流动感知的影响及其机制》，心理科学）。因此，如果两个变量之间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是否还可以分析它们的交互作用？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诚如您所言，经济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无论是客观指标还是主观感知）在现实中确实相互关联，并非独立。在修改稿中，我们认为经济不平等是塑造社会流动信念的重要前因，并进一步影响地位焦虑，即经济不平等（宏观结构）→ 流动信念（社会心理机制）→ 地位焦虑（个体/群体情绪体验）。这样更清晰地揭示了从宏观结构到微观心理的完整作用过程。

意见 3：对社会流动性作用的介绍有失偏颇，只介绍了向下流动，而没有介绍向上流动

1) 根据文中的观点，社会流动性会加剧地位焦虑感，意思是社会流动性越高，中产群体的地位焦虑越严重。但事实上，这个说法是有失偏颇的，作者实际上只讨论了向下流动的影响，即害怕被超越、感到身份威胁、对下落的防御等，而基本上没有讨论向上流动的影响。因此，“社会流动性”这个词用得太大了，不需要那么大，建议直接改成“向下社会流动”更恰当。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删除了初稿中关于“社会流动性（作为一个笼统概念）触发焦虑”的论述。在修改稿中，我们不再将社会流动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与经济不平等并列的变量来讨论，而是将其纳入宏观路径模型中一条核心机制（见修改稿 3.2.2 流动信念：地位改变的可能性）。

2) 而且，如果同时考虑了向上和向下社会流动的话，就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对中产阶层

来说，既有向下流动的恐惧（即文中已经介绍的），又有向上流动的希望（文章里有意无意忽略的），这两者对于焦虑的影响，很可能是相互抵消的。这么一来，也就不存在“社会流动性触发中产焦虑”的说法了，即动摇了文章的基础论点。作者需要对此进行说明。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在修改稿中，（1）我们将“向上”与“向下”两个维度，系统性地整合进趋近-回避动机框架进行解释（见修改稿 2.1.2 社会心理基础：地位寻求动机、2.3 地位焦虑的概念重构）。向上流动的“希望”关联趋近动机，向下流动的“恐惧”关联回避动机。经济不平等通过影响这两种动机的实现或冲突来塑造焦虑。（2）在修改稿 5 总结与展望 中提到了焦虑的最终水平可能取决于“向上流动的阻力”与“向下流动的风险”这两种心理效应的相对强度(Melita et al., 2023)，两者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可能涉及多重机制的同时作用（见修改稿 5.2 局限与测量完善）。

3) 此外，论述过程中，似乎还有一个矛盾之处。如果向上社会流动对应着向上比较、向下社会流动对应着向下比较，那么作者在介绍经济不平等的影响时，声称“社会比较表现出一种显著的不对称性：相较于向下比较，向上比较具有更大的权重”（2.2 地位焦虑，倒数第一段）；而在介绍社会流动性的影响时，又声称“（中产群体）对于可能的地位下落产生了一种威胁感，并展现出一种普遍的防御性反应”（3.3 对下落的防御）。这样一来，按照文中的逻辑，经济不平等对地位焦虑的影响是由于向上比较，然而社会流动性对地位焦虑的影响是由于向下比较，岂不是前后矛盾了吗？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在本次对全文的理论重构与大幅修改中，我们已将这部分内容删除。

意见 4：文中的某些逻辑，可能会引起价值观上的歧义

在文章中，作者反复强调的一点是，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是有害的，会加剧中产和富人的焦虑。那么，反过来说，为了缓解这些人的这种焦虑，是不是就应该回到社会流动性低、阶层固化的社会里，才是最好的呢？才最能够解决所谓的焦虑问题？

虽然文中没有明说（也不能明说），但是读起来的时候，一直令人感到挺别扭。解决方法也不困难，就像前面提到的，把论证局限在“向下社会流动”的影响上面，而不要泛泛而谈“社会流动”的影响，可能不失为一种补救方式。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完全理解您的担忧，初稿中关于“社会流动性加剧焦虑”的绝对化表述，确实可能引发“流动本身有害”的误解，这绝非我们的本意。我们想澄清的核心论点是：并非社会流动本身不好，而是在经济不平等加剧的宏观背景下，流动的机会与规则本身可能已被扭曲。我们所批判的，是这种“在不平等结构下功能被异化的流动”——它可能非但未能缓解焦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与不平等结构形成共谋，成为维持现状的隐性机制。为避免这一歧义，在修改稿中，我们已删除这一部分可能引发误解的笼统论述。

意见 5：“总结与展望”部分的讨论有待加强

1) 根据自检报告的标准“最后的总结或展望是否是基于前面论述的基础上提出的？对已有理论是否有所发展？”这篇文章的“总结与展望”部分有待加强。

“4.1 中产群体的界定”和“4.2 焦虑的测量”本质上都是在讨论测量方法的改进。而且有一个奇怪之处是，“中产”和“焦虑”都是本文的核心概念，应该在文章最开头就解释清楚才对，如果核心概念和定义都仍然模糊，那么文章的可信度也堪忧了。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您指出的“中产群体的界定”与“焦虑的测量”应前置的问题，在本次对全文的理论重构与大幅修改中，我们已将初稿中 4.1 中产群体的界定的独立章节删除，其中关于中国社会结构下地位焦虑研究对象问题的思考，前移至 2.2.3 对象局限 中进行分析。初稿中 4.2 焦虑的测量 部分已重新融入修改稿中的 5.2 局限与测量完善 进行讨论。

2) “4.3 文化背景的加持”完全是凭空冒出来的，跟文章前面介绍的机制和变量之间的互动完全没有关系，建议修改或者删去。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文化背景的加持”等与主线关联较弱的内容已删除，确保了论述的聚焦与连贯。

3) “4.4 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启发”提出了一些展望，比如呼吁“政府的政策应该更加完善、社会的环境应该更加包容”等等，但还不够。按照我的理解，展望不只是提出政策建议，还应该包括对理论的发展，以及提出新问题、即在已有理论和研究的基础上，还有哪些有新意的、有价值的问题，值得未来研究？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针对您的意见，基于前文论述，我们在修改稿中对 5 总结

与展望部分进行了重构与深化，包含理论贡献、局限反思、新兴议题与政策启示。具体内容如下：在 5.1 理论贡献中系统总结了本文在概念模型（基于认知-动机过程的二维四象模型）、机制路径（微观-宏观双路径模型）和本土视角（基于中国土字型社会结构）三个方面对已有理论的发展与补充，并明确了其与文化心理学、社会认同理论的对话点。在 5.2 局限与测量完善中指出了本研究及领域内在测量方法上的挑战，并基于本文提出的新框架，明确提出了开发新测量工具、采用多元方法等具体的未来研究方向，这本身即是对理论深化的重要展望。在 5.3 新兴议题与展望部分，我们并未停留在泛泛的政策呼吁，而是基于本文框架，前瞻性地提出了两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新兴研究方向：一是技术变革的影响：分析了人工智能、自动化如何与现有经济不平等结构互动，可能催生具有阶层差异的新型地位焦虑形态（如科技失业引发的“人工智能焦虑”）；二是风险社会的放大效应：探讨了公共卫生危机、气候变化等宏观风险如何与经济不平等交互，加剧“风险不平等”并塑造差异化的焦虑体验。在 5.4 社会治理与政策启示中，基于前文的双重路径模型，提出了对应微观（价值引导）与宏观（机会结构改革）的差异化治理思路，使政策建议与理论机制紧密挂钩。

意见 6：文中的一些修辞，读起来很奇怪，其实没必要为了修辞而修辞。

1) 比如，作者说了，这篇文章的一大贡献是区分了地位焦虑的“根源”（经济不平等）和“触发因素”（社会流动性）。但问题是，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关系（或者虽然存在，但是本文没有清楚地讲明白）。换句话说，抛开社会流动性，经济不平等造成的地位焦虑仍然存在（甚至经济不平等本身就有可能影响社会流动性），反之亦然。正如前面提到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加一”的简单叠加，而不是“一乘一”的交互作用或者其它什么复杂关系。

2) 作者还说了，本文区分了“动态和静态的比较”，即经济不平等相关的社会比较是静态比较，而社会流动性相关的地位比较是动态比较。照我看来，这种区分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比较”这个概念本身无所谓静态还是动态，何况如果是涉及到地位焦虑的话，既然地位是相对的，那么无论怎样，都只能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才能确定自己所在的位置。

建议省去不必要的修辞，避免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在本次对全文的理论重构与大幅修改中，我们已将相关内容删除。

意见 7：为什么作者强调不平等和流动性导致的焦虑是不同的？

还有一个令人疑惑的地方，作者反复强调，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都会导致中产焦虑，但这两种焦虑是不同的。比如：“但需要明确的是，前文所述的地位焦虑和由社会流动性引发的焦虑并不在同一维度上。”（3.4 两种焦虑的交织，第二段）

“此外，虽然向下流动恐惧和地位焦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都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身份密切相关。”（3.4 两种焦虑的交织，第二段）

如果这两种焦虑完全是不同的概念、不在同一维度上、不具可比性的话，那么这篇文章为什么还要把两种焦虑放到一起比较？还要大费周章地区分了根源和触发因素？既然谈的是地位焦虑，那就都是通过社会比较得出来的，不是吗？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在本次对全文的理论重构与大幅修改中，我们已将相关内容删除。

意见 8：经济不平等直接影响的，似乎是资源焦虑，而不是地位焦虑？

作者提出了“经济不平等增加了地位焦虑”这个观点，但是根据文中的论述，经济不平等真正增加的似乎是资源焦虑才对，而不是地位焦虑？

比方说，文中介绍的理论和研究有：

“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在不平等社会）个体在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在获取稀缺资源时的优先权”（2.1 对地位的关注，第一段）

“较高的社会阶层为个人提供了选择和获得丰富资源的自由”（2.1 对地位的关注，第二段）

“不平等以经济资源来划分社会，使经济差异更加突出，……促进了基于财富的分类，并增加了与财富和贫困相关的词汇使用”（2.1 对地位的关注，第三段）

“此外，更大的不平等会导致人们意识到，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2.3 地位寻求，第一段）

根据这些理论和研究，人们对地位的关注和寻求，本质上是为了资源（财富）嘛！这么一来，直接论证“经济不平等对中产资源焦虑的影响”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引入“地

位焦虑”作为中介呢？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在此我们需要做一点澄清，如果只是资源焦虑，那么客观资源本身的多寡应该是在基本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引发个体的焦虑。当基本需要满足之后，人为什么还要继续追求资源呢？因此我们认为，在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的现代社会，驱动地位焦虑的核心心理机制并非单纯的经济资源多寡，而是资源所象征的、在群体比较中所获得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认同”。理由如下：

(1) 财富与地位的本质不同：在修改稿 1 引言第二段中，我们已澄清：“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讨论的“地位”指的是社会经济地位(以下简称地位)，而非纯粹的财富概念。研究表明，两者存在重要区别：财富通常被视为可以用金钱衡量的商品，主要关乎物质层面更强的控制感、自给自足感和独立性(Zhou et al., 2009)，但地位是通过社会认同形成，依赖于他人的认可，与更高的满意度、自尊和身体健康相关(Adler et al., 2000)。正如 Wilkinson 和 Pickett(2010)所言，“较高地位几乎总是带有优越感、成功感和能力感的暗示”。尽管社会经济地位不如种族或性别等主要社会身份那样外显，但它仍是一种独特的社会身份(Destin & Debrosse, 2017)。”因此将“地位焦虑”等同于“资源焦虑”，简化了其社会心理内涵。

(2) 地位焦虑来源于群体认同与比较过程：本文的分析框架建立在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 Turner, 1979)之上。该理论指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社会认同来获取自我价值。地位焦虑正是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人们基于财富等符号将自己归类于不同社会群体（如“中产”、“底层”）。通过与内群体（我群）和外群体（他群）的持续比较，来评估和确认自身的群体地位。对地位下滑的焦虑，本质上是对积极社会认同受损的恐惧，而不仅仅是对资源减少的担忧（见修改稿 2.1.2 社会心理基础：地位寻求动机）。若仅讨论“资源焦虑”，则无法涵盖这一完整的社会认知与群体心理过程，也无法解释为何在资源相对充足的情况下，比较带来的焦虑依然强烈。

第二轮

审稿人 2 意见：我很高兴看到作者对这篇稿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修改，并且十分清楚地回复了审稿人在上一轮审稿时提出的问题。我认为修改稿已经基本达到了发表要求，还有一些小问题可以再改进一下。

意见 1: 作者在文中强调,“地位”指“社会经济地位”(如 p14),并区分了地位与财富的区别。不过,“社会经济地位”本质上还是凸显了“经济”,建议直接改成“社会地位”。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根据专家建议,我们认真鉴别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两个概念,并回溯阅读了地位焦虑相关的文献,认为本文核心构念“地位焦虑”意指人们关于其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焦虑,据此在相应位置作出如下关键说明(详见修改稿 p.20),请您审阅:

“有关地位焦虑的研究由来已久。……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讨论的“地位”指的是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即由收入、教育与职业等指标界定的结构性位置(Adler et al., 1994),它既不同于主要强调声望与尊重的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 Magee & Galinsky, 2008; 郭永玉 等, 2015),也不同于纯粹的财富(wealth)概念。”

关于采用“社会经济地位”而非“社会地位”作为核心概念的依据如下。

第一,在基本内涵方面,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是指收入、教育与职业等指标界定的结构性位置(Adler et al., 1994),实证研究中多采用主观或客观指标进行考察。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则指个体或群体获得他人尊重或钦佩的程度(Magee & Galinsky, 2008),也被称为“声望(prestige)”或“社交地位(sociometric status)” (Anderson et al., 2015),具有更强的主观性。可见,社会经济地位是与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鉴于本研究探讨的“地位焦虑”本质上是人们对自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及其稳定性的担忧,因此基于收入、教育、职业等综合指标考量的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比单纯强调声望、尊重等的社会地位更加准确地表达这一内涵。

第二,在研究问题方面,本研究聚焦于经济不平等这一宏观社会背景下的社会心态,在此分析视域下,由收入、教育和职业等指标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是衡量个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所处位置更直接、更客观的综合性指标,因而也是社会比较与焦虑产生的核心。

相关参考文献:

郭永玉, 杨沈龙, 李静, 胡小勇. (2015). 社会阶层心理学视角下的公平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3(8), 1299-1311.

Adler, N. E., Boyce, T., Chesney, M. A., Cohen, S., Folkman, S., Kahn, R. L., & Syme, S. L. (1994).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The challenge of the gradi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49, 15-24.

Anderson, C., Hildreth, J. A. D., & Howland, L. (2015). Is the desire for statu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e?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1(3), 574–601.

Magee, J. C., & Galinsky, A. D. (2008). Social hierarchy: The self-reinforcing nature of power and status.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 351–398.

意见 2：作者在文中提到了“社会阶层”（p15），似乎把“社会阶层”等同于“地位”。不过，在大部分研究里，“社会阶层”被认为是客观财富和主观地位的总和（如 Kraus et al., 2012），建议在文中明确区分清楚这两个概念“社会阶层”和“地位”。

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Rheinschmidt, M. L., & Keltner, D.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 546–572.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正如前述意见 1 中所说明的，本文中的“地位”是指“社会经济地位”，以下我们围绕“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两个概念进行回应。

第一，在以往大量关于社会阶层的文献中，社会阶层(social class)与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往往交替使用(王淑燕 等, 2023; 杨沈龙 等, 2020; Kraus et al., 2012; Manstead, 2018)。当前研究中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原因。(1) 二者在概念内涵上具有一致性。社会阶层是指由于经济、政治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的群体，这些群体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社会资源(收入、教育和职业)的差异以及其主观上所感知到的社会地位差异(Kraus et al., 2012; 郭永玉 等, 2015)。基于上文在“意见 1”回应中所述社会经济地位的概念内涵可知，二者均侧重个体在社会分层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均基于收入、教育、职业等综合指标予以考量，且均有主观成分与客观成分之分。(2) 实证研究中往往将社会阶层操作化界定为社会经济地位，并通过与后者相关的指标来予以考察(郭永玉 等, 2015)：例如，将客观阶层操作定义为收入、教育或职业等(Kraus et al., 2009; Piff et al., 2010)；对于主观社会阶层的测量通常采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MacArthur Scale; Piff et al., 2010)。(3) 理论上，不同研究者尽管会使用不同的术语表述，但往往基于相同的理论基础(如，阶层的认知理论；Kraus et al., 2012)。

第二，鉴于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上述客观现象，本文在行文过程中，根据语境的不同使用合适的术语表达。同时，根据专家建议，修改稿在文章开篇论述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概念时，以脚注形式说明了两个概念的联系，以及本文的处理方案，具体如下（详见修改稿 p.20）：

注：需要说明的是，以往研究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与“社会阶层”（social class）两个概念常交替使用（杨沈龙 等, 2020; Kraus et al., 2012; Manstead, 2018）。鉴于此，本文在行文过程中，根据语境的不同使用了合适的术语表达。

相关参考文献：

Kraus, M. W., Piff, P. K., & Keltner, D. (2009). Social class, sense of control, and social explan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 992–1004.

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Rheinschmidt, M. L., & Keltner, D.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 546–572.

Manstead, A. S. R. (2018).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How socioeconomic status impacts thought, feelings, and behaviou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7(2), 267–291.

Piff, P. K., Kraus, M. W., Côté, S., Cheng, B. H., & Keltner, D. (2010). Having less, giving m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5), 771–784.

王淑燕, 刘启鹏, 江伟. (2023). 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与研究操纵：现状与问题——基于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心理研究*, 16(1), 12–20.

杨沈龙, 喻丰, 胡小勇, 郭永玉. (2020). 心理学研究中社会阶层的操作化界定及其衍生问题. *心理科学*, 43(2), 505–511.

意见 3：作者在 introduction 部分，先提出“经济不平等可能引起地位焦虑”，再提出“为何在机会平等叙事日益普及的今天，地位焦虑反而愈发强烈”（p15），逻辑有点颠倒了。建议把这两个部分的顺序调过来，先提出现象（当今社会上存在地位焦虑），再提出解释（经济不平等作为一种可能解释），即改成：

然而，一个引人深思的悖论在于：现代社会普遍推崇的、承诺“人人皆可通过努力实现向上流动”的优绩主义，并未能如其许诺般缓解人们的地位焦虑。当成功被归因于个人努力，失败也就被视为个人的耻辱(Davidai, 2018; Melita et al., 2023)；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不断展示生活方式，使得更多人感受到的是“达不到”的挫败。这促使我们追问：为何在的“精致”机会平等叙事日益普及的今天，地位焦虑反而愈发强烈？

多项实证研究显示，经济不平等与地位焦虑存在显著关联(Delhey et al., 2017; Layte & Whelan, 2014; Melita et al., 2020)。收入差距的扩大，促使社会经济地位愈发成为衡量自我价

值的重要维度(Walasek & Brown, 2019)。人们更加重视自身社会经济地位，进而引发个体对自身地位的普遍焦虑(Melita et al., 2023)。……

修辞上可以再调整得更通顺一些。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已根据您的建议，调整了论述顺序，具体如下（详见修改稿 p.21），请您审阅：

“将这一整合性视角置于经济不平等的现实背景下，有助于理解一个当代悖论：为何现代社会普遍推崇的、承诺‘人人皆可通过努力实现向上流动’的优绩主义，未能如其许诺般缓解人们的地位焦虑？……普遍的地位焦虑，或许只是表象，其深层反映的正是经济不平等这一社会现实。多项实证研究显示，经济不平等与地位焦虑存在显著关联(Delhey et al., 2017; Layte & Whelan, 2014; Melita et al., 2020)。”

意见 4：采用“趋近-回避”动机构建理论框架，这个做法很有巧思！我有一个小问题，既然“地位追求则主要由趋近动机驱动”（p19），那么它应该是属于地位焦虑的一个部分，是这样吗？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肯定和进一步建议！

很抱歉，原文中“地位追求则主要由趋近动机驱动”的表述及其所在语境，确实容易给读者带来概念上的混淆。我们已在修改稿中进行了如下修订，以使两者的逻辑关系更加清晰：

第一，结构调整。我们已将原文中关于“实证研究常将地位焦虑简化为地位追求”的讨论，从“2.1.2 社会心理基础：地位寻求动机”（p.23）部分整体移至“2.2 传统视角的特点及局限”之“2.2.2 动机机制”部分（p.25）。这一调整旨在明确指出，以往研究将二者简单等同是一种需要被澄清的研究局限。

第二，理论澄清。在修改稿中，我们依据 Elliot(2006)的趋近-回避动机理论，对两个概念进行了明确区分：

社会经济地位作为一种基本的等级形式，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人类对更高社会地位的追求与渴望，源于在等级社会中演化而来的深层动机(Anderson et al., 2015)，它构成了一种基本的社会心理需求与驱力(Chen et al., 2012)。这种地位寻求并非单一的趋近倾向，而是

一个包含了趋近(追求更高地位)与回避(避免地位丧失)两个维度的整体动机系统。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引入趋近-回避动机框架，来解读地位寻求这一基本驱力如何转化为具体的心理体验。我们并非将地位追求简单等同于趋近动机，而是用这一框架来剖析地位寻求过程中两种方向性动机(渴望获得与害怕失去)的动态作用。

基于上述框架，本文对“地位焦虑”作出了更精准的界定：它并非地位寻求本身，而是当个体的地位寻求过程遭遇挫折、威胁或内在冲突时——特别是当趋近动机受挫(求而不得)，或回避动机被强烈激活(害怕失去)，或两者持续冲突——所产生的一种典型的负面情绪状态。

所以在本文修正后的理论逻辑中：地位寻求是基本的动机来源。趋近-回避动机理论是我们用以分析该动机系统的工具。地位焦虑是该动机系统在特定情境下(受挫、冲突)的情绪结果，而非动机本身。

原文中“地位追求则主要由趋近动机驱动”这一表述已删除，具体修改内容见修改稿
2.2.2 动机机制(p.25):

“在现有实证研究中，地位焦虑常被解读为单纯的地位追求，即对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持续驱动(Blake & Brooks, 2019; Du et al., 2022; Paskov et al., 2017)，这种观点或将地位追求视为地位焦虑的核心表现，或认为二者互为因果(Paskov et al., 2013)。然而，地位追求的实质是一种动机，人类对更高社会地位的追求与渴望，源于在等级社会中演化而来的深层动机(Anderson et al., 2015)；由财富与收入等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被视为一种“等级”(郭永玉等, 2015)。……因此，将地位焦虑简单还原为地位追求，未能涵盖其更复杂的心理实质。

本文认为，地位追求并非单一的“趋近”倾向，而是一个包含了趋近(追求更高地位)与回避(避免地位丧失或寻求失败)两个维度的整体动机系统。基于 Elliot(2006)的趋近-回避动机理论，……”

相关参考文献：

Anderson, C., Hildreth, J. A. D., & Howland, L. (2015). Is the desire for statu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e?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1(3), 574–601.

Chen, Y.-R., Peterson, R. S., Phillips, D. J., Podolny, J. M., & Ridgeway, C. L. (2012).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Bringing status to the table—Attaining, maintaining, and experiencing status in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 *Organization Science*, 23(2), 299–307.

Elliot, A. J. (2006). 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approach-avoidance motivatio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30(2), 111–116.

第三轮

审稿人 2 意见：谢谢作者的回复，我认为修改稿已经达到了发表要求！

编委 1 意见：同意发表。

编委 2 意见：同意发表。

主编意见：稿件经过多位专家的审阅，作者进行了认真的修改，达到了发表水平，同意发表。